



中國五四新文學困境及其青春期特徵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現代性」轉型失敗的結構性內因分析

曹，光明

(Citation)

海港都市研究, 19:41-46

(Issue Date)

2024-03

(Resource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Version)

Version of Record

(JaLCD0I)

<https://doi.org/10.24546/0100488380>

(URL)

<https://hdl.handle.net/20.500.14094/0100488380>



中國五四新文學困境及其青春期特徵研究

——中國現當代文學「現代性」轉型失敗的結構性內因分析——

曹 光明

(CAO, Guangming)

I. 引論

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¹⁰²已歷經百年歷史，然而中國現代文學乃至其後的中國當代文學是否已經完成了其現代性使命，還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現代性未完成問題，不少當代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楊春時先生《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一書中專門有一節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的未完成性」，胡傳吉先生《未完成的現代性：20 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論》等。然而這些研究似乎都未切中要害，沒有找到「病根」所在。基於此，類似於心理分析學派往往從人的童年去尋找答案的做法，本文也回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初始時期「中國五四新文學」入手，分析其一開始就攜帶的先天結構性的內在矛盾與困境，並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潮流的大脈絡中探討這種結構性的「先天不足」是如何導致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無法順利完成其現代性使命的問題。以期為五四新文學以來的現當代文學的總體脈絡的研究提供新的詮釋框架，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現代性」發展與完成作出貢獻。

「五四新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並不特指 1919 年開始的「五四運動」的文學，文藝往往最先感受的時代到胎動，新文藝的產生必然是早於標誌性社會歷史事件，且影響著社會事件的。故而，我們這裡說得「五四新文學」指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個十年，即 1917-1927 之間的文學。1917 年《新青年》雜誌遷到北京，集結了一批推進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先驅人物。胡適率先發表《文學改良奏議》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主張。緊接著，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將「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目標，以及其它一些文化名人圍繞著「新文學」都進行了廣泛討論，由此開啓了中國近代的「五四新文學」。之後，由於 1927 年「四·一二事變」後很多新文學作家投身到北伐戰爭中，創作一度沈寂，並開始提倡「革命文學」的理論。所以學界普遍將這十年的文學看作一個整體，它是中國文學新舊交替的激蕩時期，也是對新文學形式與內容、理論與方法的探索時期，更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困境的時期。

五四新文學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實績的一部分，擔當著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任。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採取與新思想、新文化相一致的文學理論¹⁰³、文學形式和文學內容。實際上當時的學者們也是從這三個方面分別著手的。理論方面，有胡適「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文學進化論主張，為文學的革新提供根本的理論基礎。文學形式上，有胡適「作詩如作文」、劉半農「重造新韻、增多詩體」等，側重從語言、形式方面

¹⁰² 在中國大陸地區學界對中國文學史的一般界定中，中國古代文學之後，主要又分為三個階段：中國近代文學（1840~1917），中國現代文學（1917~1949）和中國當代文學（1949~至今）。廣義的「中國現代文學」是包含「中國當代文學」的，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是包含 19 世紀末期在內的整個 20 世紀文學及當下的文學。本文採用一般的界定，將 1917 年以來的文學合稱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¹⁰³ 通常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包含文學形式和內容問題，這裡所說的「文學理論」是狹義上的文學理論，指關於文學本質、文學方向等抽象的文學問題的理論。

為文學革命尋找突破口。文學內容上，有周作人，以「人的文學」來概括新文學的文學內容。至於在行動舉措方面，包括：廣泛引入外國文藝思潮、與傳統文學流派的論辯、建立新文學社團、新文學的創作與實踐等等。雖然經歷了以上種種理論主張和活動舉措，筆者認為文學的現代化問題依舊沒有得以實現，或者說，還在實現的路上，還處在文學現代化的青春期。這是由於五四新文學在中西文化大碰撞背景下在各個方面所面臨的矛盾與困境所導致的，使其發展上進退維谷，左右失據。

II. 五四新文學困境

1 文學理論的困境——雙向逆反的「混水閥困境」

20 世紀初的中國，隨著清政府的倒台，民國的建立，國門才真正的充分打開，國人此時也從對西方器物、制度的學習轉向對文化思想的學習。然而，當時國人所面對的西方思想文化界確是一個光怪陸離狀態，新古典主義、啓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心理分析學派、唯意志主義、馬克思主義、唯美主義、象徵主義……紛亂雜章，各標其是。西方以二三百年的時間發展了這些思想流派，而且這些流派基本上是以後起者作為對前起者的超越形式而存在的。我們在短短幾年並行引入這些前後矛盾思潮，也就化原本「時間性前後對立」為「空間性並存分立」的局面。結果就是，任何一種思潮尚未及扎根深耕立足就已經受到其後起思潮的批評與否定，而這些後起的思潮原本是在前一個思潮發展成熟甚至僵化後才自然產生的，但在這裡我們直接就拿來扼殺前一思潮的萌芽了。所以，就造成什麼都發展不起來，很多思潮都是曇花一現的現象。這如同我們沐浴時所使用的熱水器混水閥，由於總是缺乏耐心等待，擰向熱水方向後，往往還沒等熱水從管道流過來就以為調得還不夠熱，於是就繼續往熱水方向旋轉，結果當熱水過來後就太熱了，於是又大幅度的像涼水方向擰，結果就又太涼了，總之，常處在一個矯枉過正的境地裡面。

在五四新文學時期，面對大量湧進的不同側重甚至相反的外國文學思潮，我們的處境就像調冷熱水一樣陷入「混水閥」困境當中。這些西方文藝思潮像走馬燈一樣閃現又消失，最終能在當時有較大影響的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而在歐洲，浪漫主義盛行於 18 世紀後半期，現實主義盛行於 19 世紀，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在對西方思潮的接受上是晚於西方 100 多年的。而以李金髮、穆旦等代表的與西方同時的現代主義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作為後進追趕型的國度，直接學習西方最新潮的文學流派，往往是失敗的，就是因為自身的文化空間內還沒有發展這種前衛文學流派的土壤。雖然各種流派思想在同一時間迸發式地傳入國內，但由於自身地相互衝突、否定性，不可能得到健康地發展，最後中國現代文學也只能從西方早已被揚棄百年的流派慢慢學起。

在這個困境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面對傳統文學，五四新文學所表現出的對傳統的雙向逆反困境。

五四文學革命所認定的封建文學觀念，一是，以「文以載道」「代聖賢立言」為標誌的載道傳統；二是，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遊戲筆墨，把文學當作供人噴飯用的娛樂消遣傳統。所以針對載道的傳統，要突出文學自身的價值，故創造社撐起西方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直覺主義思潮的大旗，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強調文學忠實地表現作者自己的內心，推崇文學的審美作用，在創作中推崇「直覺」和「靈感」，側重自我表現。另一方面，針對遊戲筆墨的傳統，又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故文學研究會又撐起西方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等旗幟提出「為人生而文學」的觀念，以人生和社會問題為題材，揭露社會黑暗和灰色人生。

這種觀念的分歧不僅表現在文學流派上，而且還表現在新文學倡導者的個人言論中，如：陳獨秀在 1916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上致信胡適：「若專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將毋同於『文以載道』之說，以文學

為手段，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抹殺「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¹⁰⁴，但在兩個月後的《文學革命論》中，又大聲疾呼「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¹⁰⁵。還有，周作人率先在新文學內容上提出「人的文學」、「平民文學」（人的文學具體化）的主張，「人的文學」口號的提出給周作人帶來很高的聲譽，但周作人很快就對其表示疑，他反省這口號中包含的功利主義。又提出「自己的園地」文學觀，認為文學根本不必「為什麼」，只是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作者對於「人生的情思」。

「文以載道」和「遊戲筆墨」本是傳統文學中對立並存的兩個方面，當新文學倡導者片面吸取西方的某一思潮，只著眼於其中一個方面進行批判改進時，往往就容易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從而造成了五四文學自身成為一個矛盾體，並在這種矛盾張力的內耗中，拖慢了新文學的前進的步伐。

2 文學形式的困境——「新體詩」的困境

文學的形式與內容是密不可分的，要想表達新的思想、文化，就須採取與之相適應的形式。中國傳統文學大部分都是文言文寫就的，就算中唐開始興起的市民文學所用的語言也是一種半文言文的形式，所書寫的也都是中國的固有的風土事物和思想觀念。而近代以後的中國，由於東西交融的廣泛深入的展開，出現很多新事物、新觀念、以及新詞彙，面對這種新文化語境，如何用現代的白話書寫日新月異的新生活、新思想就成為文學改革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由此產生了五四新文學形式上的困境。

白話文全面應用於文學，對於散文、小說、戲劇問題都還不太大，因為散文、小說、戲劇（現代話劇）所使用的語言都是日常的語言。但對於高於日常語言的「詩」如何在拋棄以文言為基礎的傳統格律形式之後，重新在白話文的基礎上找到新的格律形式卻成為一個大問題。正如林庚先生所說：

白話文學是否可以成功，在散文方面問題尚少，在新詩方面問題非常之多。第一，白話文雖不曾成為書籍，可存在每個人的口上，只要我們說出話來，已經便是白話文，所差只是沒有用紙筆記載下來而已……但對於白話詩卻沒有這麼方便，因為我們平常所說的話只可以說它是白話，卻不能說它就是白話詩，白話是現成的，白話詩卻還得有待於創作……這新詩既不存在於已有的筆墨上，又不存在於今日的唇舌間，我們想象那真是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局面了。¹⁰⁶

散文基本沒什麼外在的形式，小說可以直接學習拋棄過去的章回體形式學習西方現代小說形式，話劇更是完全引進西方。所以說，五四新文學的形式困境主要表現在「新詩」的創作上。

從晚清到民國，很多學者都在進行對新詩形式的探索：1899年，發動「詩界革命」的梁啟超等人提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的主張，產生黃遵憲「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之類不倫不類的詩，這明顯不是現代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1917年，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中提出「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新增無韻詩）等主張，但只停留在理論階段，並沒有出現相應的成功的作品，這從另一個角度也證明瞭其理論的不可行性。1919年，胡適在《談新詩》一文中提出「作詩如作文」的新詩主張，完全不顧格律，重自由，最終把現代詩寫的像翻譯詩或散文。郭沫若的詩作可以視作這種極端自由

¹⁰⁴ 陳獨秀：《致胡適之》[J]，《新青年》，1916，第2卷，第2號。

¹⁰⁵ 劉增傑，關愛和主編：《中國近現代文學思潮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第327頁。

¹⁰⁶ 林庚著：《中國新文學史略》[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第29頁。

詩的代表，他也主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他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但是我們看他的《鳳凰涅槃》也好、《天狗》也好，除了口號呼喊外，我們似乎並不能從中感受到詩該有的詩性。直到1926年，聞一多、徐志摩等前期新月派詩人，他們主張要「創格」，要發現「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認為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徐志摩也創作很多文韻兼美的詩作。至此，中國的新詩形式探索才初有眉目。但也正如梁實秋在《詩刊》創刊號中《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一文中評論前期新月派的詩人們所說的：「你們的詩的觀念是外國式的，你們在詩刊上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來裝進外國式的詩意。」¹⁰⁷ 以及劉夢葦在《中國詩底昨今明》一文中所說的：「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本心，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¹⁰⁸ 歸根結底，前期新月派詩人們也還沒有跳出西洋詩的窠臼。

所以直至五四新文學時期的最後階段，中國現代新詩也沒有在白話文（現代漢語）的場域中提煉出它特有、應有的形式。中國新詩之所以會面臨如此大的困境，主要是五四新文學時期所面臨的兩大斷崖式的割裂，其一就是白話文與文言斷崖式割裂，其二就是「新詩」與「舊體詩」斷崖式割裂。這種割裂致使古今沒有一個平緩的過渡，直接把新詩拋入一個孤立的陌生之域，任其艱難探索。

3 文學內容的困境——「人的文學」的困境

五四新文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擔負著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以及進行民眾啓蒙的重任。在此基礎上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的主張也是歷史的必然，「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¹⁰⁹。

「人的文學」的提出，是周作人先生有感於歐洲自14、15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便發現了「人」並開始高揚「人」的價值，而中國卻一直沒有發現「人」的事實：

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第一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餘年，現在卻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見‘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便是這個意思。¹¹⁰

文學內容上進行人文主義的啓蒙，高揚「人」的價值，這本是文學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但作為一個近代化的後起國度，在這方面同樣面臨著困境。這源於在西方世界里早已完成了「高揚人性」與「貶低人性」、「啓蒙」與「反啓蒙」的自反過程，而五四新文學面臨這種對「人」價值的自反變得矛盾和無所依從。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既產生了米蘭多拉《論人類尊嚴的演講》這樣為人類的高貴贊唱歡呼的作品，但隨後也出現了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這樣的為功利而完全泯滅道義的赤裸裸展現人性之惡的作品。人的自由解放，所解放的不光是人性的善，同時還有人性的惡。當文藝復興在高唱人的高貴的同時，卻總是被人的動物本性一次次打臉。

而18世紀的啓蒙運動標榜人的理性，認為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完善自己和社會，但隨後產生的法國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又讓人對啓蒙和理性產生深深的懷疑。隨後18世紀末興起浪漫主義運動和唯意志論否棄了

¹⁰⁷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J]，《詩刊》創刊號，1931，第1期，第87-92頁。

¹⁰⁸ 劉夢葦：《中國詩底昨今明》[J]，《晨報副刊》，1925，12月12日卷，第14-16頁。

¹⁰⁹ 陳平原選編：《新青年文選〈人的文學〉》[M]，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第122頁。

¹¹⁰ 陳平原選編：《新青年文選〈人的文學〉》[M]，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第121頁。

人的理性的高貴，而高舉人的情感和意志。

以上種種關於「人」的矛盾性，讓五四新文學作家們面對「人性」面對「啓蒙」就陷入了重重矛盾當中。在這一點最具代表性的當屬魯迅先生。

關於文學對人的啓蒙與否的困境，在魯迅那裡被形象的比喻為「鐵屋子理論」，到底是把鐵屋子裡的人叫醒，讓他們直面痛苦，隱忍掙扎，以期有一天他們能衝出鐵屋？還是與其叫醒他們後卻發現無路可走，陷入絕望，不如不把他們叫醒？魯迅的這種矛盾既體現在「我」對祥林嫂關於「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靈魂？」的發問所表現的吱吱唔唔，也體現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對時代新女性離家出走後命運的悲觀斷定上。

關於「人性」的困境，魯迅先生既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指出了「民族脊梁」所在，但又在阿 Q、華老栓、閏土、孔乙己身上展現了人性的落敗。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當時中國處在內外交困衰敗落後時期，這種對人性的矛盾往往表現為對國民民族性的矛盾。即五四新文學作家們往往把人物的「惡」都歸結於文化傳統的痼疾，對醜惡人性揭露往往指向傳統文化所塑造的民族性。而沒有像歐洲文藝復興的學者們從抽象人性角度來看人性中固有的「獸性」。從而造五四新文學作家們在促成人們的國際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反思鞭撻國民性劣根上所面對的矛盾困境。

III. 五四新文學青春期特徵

中西文化碰撞下五四新文學所面臨的以上種種困境，都類似於青春少年所面臨的困境。所以本文把這一時期的文學狀況總特點稱為「文學青春期的激情與哀傷」。

青春，所帶給我們的是新鮮、活力、激情、個性追求、無限的憧憬和無限的鬥志、是一切的可能性。正如郭沫若《天狗》一詩所表現出的那種打破一切，再以「我」重建一切的激情。「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 X 光線的光，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總量！」（郭沫若《天狗》）

而另一方面，青春又總是伴隨著迷茫、哀傷、苦悶和徬徨。正像人青春期的愁苦來自身體的迅速成熟與心理的尚未成熟而又渴望成熟所帶來的張力與衝突，五四新文學所面臨的同樣也是想要迅速地實現文學的現代化，然而現實的環境又不具備足夠文的條件或面臨重重阻力。他們既不滿於舊的，但對新的又缺乏信心，處於一種進退兩難之境。它不同於歐洲文藝復興時衝破中世紀黑暗帶來的解放的喜悅，也不同於啓蒙運動所具有的堅定的理性力量。在中國，個性解放帶來的苦悶和徬徨總是多於喜悅。

首先，就是悠久的文化傳統難以打破，要打破就可能「矯枉過正」，而不同側面的「矯枉」往往又構成自身的雙向逆反，進而否定自身、消解自身。

其次，就是前進方向的選擇項本身又相互矛盾逆反，選擇任何一種都代表著選擇的是矛盾的一方或選擇的是已被超越的低級形態。從而讓「青春的激情」無處釋放或陷於責難當中，產生青春的苦悶與徬徨。

最後，五四新文學不僅要從形式上與過去的文學傳統斷裂，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新詩代替古體詩，以西方新小說代替文言小說、章回體小說，以話劇代替傳統戲曲……而且文學內容上也要與過去文學傳統斷裂，不在弘揚「道統聖賢」而是高揚「個體自我」的解放。然而，不論是形式上還是內容上，只「破」卻未「立」成，讓五四新文學人在一片廢墟中橫衝直撞，艱難的掙扎著尋找未來的出路。這種與自身過去的完全斷裂，必然使自己陷入不安與惶恐之中。正如青春人對自己過去一切的叛逆一樣，往往使自己陷入一種自我迷失當中。

可以說中國五四新文學，總體上是哀傷大過激情的，帶有一定的悲劇性色彩。在這種青春的苦悶徘徊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國現代文學，還未及發展成成熟的「成人」，就又面臨 1927 年開始的國共內戰，1931 年的東北淪陷，以及 1937 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也就是李澤厚先生所說的「救亡壓倒啓蒙」。正是因為那時的「啓蒙」尚未完成，所以才有 80 年代的「二次啓蒙」。然而在 80 年代末「二次啓蒙」又戛然而止，接著又是 90 年代經濟壓倒人文……直到今天，我們能說我們的「現當代文學」成熟了嗎？或者只是「衰竭於青春之未萌」？像何其芳先生《慨嘆》一詩中所寫的，是一朵「死在青條上未開的花」？但就當代的「新詩」來看，不論就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還未形成一種成熟的形態，不僅沒有繼承到五四新詩的傳統，更沒有繼承 80 年代新詩的傳統。

正是這一青春期特徵，給後期中國現代文學道路發展帶來了不可回避的困境與阻礙。無論是 20 世紀前半期的「救亡壓倒啓蒙」，還是 80 年代的「二次啓蒙」乃至 90 年代以後的「經濟壓倒人文」之現象，其實都只是勾畫出了這種「困於青春期矛盾」的不成熟的色彩。是中國五四新文學的這種「先天不足」，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現代性」才在以後的種種歷史際遇里，一直被困束。

總而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現代性」轉型的失敗其根本原因是結構性的，即中國現代文學初期階段在理論、形式、內容方面所先天攜帶的種種內在矛盾與困境。帶有這些矛盾與困境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就像是一個「青春少年」有待進一步發育成熟，但其後種種的歷史際遇又沒有給「他」一個順利發育成長的機會，乃至於直至今今天中國現當代文學還沒有完成其「現代性」的使命。

參考文獻

（中國語拼音順序）

- [1] 陳獨秀：《致胡適之》[J]，《新青年》，1916，第 2 卷，第 2 號。
- [2] 陳平原選編：《新青年文選〈人的文學〉》[M]，貴州：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
- [3] 胡傳吉著：《未完成的現代性》[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9。
- [4] 梁實秋：《新詩的格調及其他》[J]，《詩刊》創刊號，1931，第 1 期。
- [5] 林庚著：《中國新文學史略》[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 [6] 劉增傑，關愛和主編：《中國近現代文學思潮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
- [7] 劉夢葦：《中國詩底昨今明》[J]，《晨報副刊》，1925，12 月 12 日卷。
- [8] 楊春時著：《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